论南京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与影响

王明德

内容提要 南京在中国近代政治地理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和她所处的经济重心区位里及其厚重的历史影响力，使她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她是近代史的开局之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起自南京；她是百川汇流的历史漩涡，为近代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展示自己力量的理想场所；她是中华民国的肇基之地，南京建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她充当了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媒介和社会整合的工具。

关键词 南京社会变迁近代中国

王明德，浙江台州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317000

南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近代史上的主要矛盾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与南京有关。这里曾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局之地，标志着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曾以南京城下的屈辱和约而结束，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沉重一页；这里曾是各种政治力量展现自己的舞台，数次成为反叛现存政权的运动中心。太平天国一路浩荡，直取南京；辛亥年的南京光复，立即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国民革命一人南京，就开始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历史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三次历史运动都是起于两广，盛于两湖，成于武昌，收功于南京。这说明南京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足以吸引四方势力汇聚于此。近代史上的潮起潮落、大喜大悲、乍暖乍寒都表现在南京的命运里。南京是百川汇流的洼地，堪当大任的重地，英雄悲歌的伤心地，她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从她的进退取舍中，可把握社会变迁的脉络，能感知国脉跳动的频率。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南京具有典型意义。

一、南京为近代史的开局之地

鸦片战争是英国政府蓄谋发动的旨在“改变中西关系的旧格局，代之以奴役中国人民的’新秩序’”的第一次侵华战争。战争终以《南京条约》的签订而结束。1842 年 8 月 29 日清政府代表奢英、伊里布在停泊于江宁江面的英舰“汗华丽”号上，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江宁条约》（又名《南京条约》）。于是，侵略者“所得到的结果，与所期望的完全相同”。在此无需赘言中国战败的原因和《江宁条约》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问题是：始于广东、历时两年多的鸦片战争何以以南京城下的屈辱和约而结束？万里东来、旨在敲开中国大门的英国侵略者何以在南京城下如愿以偿？清政府的完全屈服为什么不是在英国舰队示威京门的时候，而是在兵临南京城下之时？映映“天朝上国”何以在南京城下“威仪”扫地，屈膝投降于一个“蛮夷”小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何以起自南京？恐怕不能说这些都是偶然因素的促成。事实上，南京在晚清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是她扮演近代史开局角色的重要因素。

“扬子江之役”是英军侵华战争计划的一部分。为达到“封锁各大河流的人海口，截断通往京师的运河粮道，迫使清政府就范”的侵略目标，英国军队不惜再次兴师北犯。他们在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沿海城市之后，没有像上次那样直犯渤海湾以威胁北京，而是径趋“帝国的心脏地带”，进犯长江，截断运河，扼住清廷的经济命脉，“以便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它认为满意的条约”。他们十分清楚长江下游地区的战略价值，特别是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镇江与瓜洲的战略意义。“在那里，南来北往的运河线穿过那条伟大的贯穿东西的扬子江水道；我们必须记住，在一八四二年……运河是南北运输的大动脉。在镇江方面的运河及扬子江口的封锁，会使向北的嘈运以及同北方各省的商品交换完全停顿。而都城北京就在北方。”长江南北两岸的镇江和瓜洲为运河锁钥，每年供应京师的 400 万石潜粮，有三分之二从这里北运。英方认为：“只要沿着扬子江攻入中国的心脏地带—江苏、安徽，甚至河南，占领南京，控制吴淞江和最重要的大运河，再占有苏州府的财富，开采那里的铁和煤，

并占领乍浦和上海，控制住全国主要的航道，我们就可掌握中国工业的主要部门。……这样，北京就自然成为我们的囊中物了。”在侵略者看来，截断运河较之直接进攻北京更为有利，因为他们获悉清政府在天津及京津一线做了抵抗进攻的布防准备，而长江一线防务空虚，他们正好避实击虚，通过截断运河，达到一种与“进攻北京”相同的效果。正如恩格斯所说：“英军这种进攻步骤底用意，是要夺取这个重要的水道，置北京于死地，并逼迫清帝立即靖和。”应当说掐断运河，将会给北京造成极大恐慌和困难，甚至会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但也不会严重到像英方所设想的那样，“一旦掐断运河，北京就会成为囊中之物，俯首就范”。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这种乐观估计居然得以应验。1842 年 7 月 21 日，经过一场血战之后，镇江陷落，英军实现了截断运河的战略目标。尔后，英舰继续溯江而上，8 月 9 日左右，进抵江宁（南京）城下，于是就有了《南京条约》。

历史的悲剧注定要在这个具有悲壮意蕴的城市上演，历史的转折点也注定要与一个堪当历史重压的地方联系在一起。南京为明代故都，朱元璋的建都、朱棣的迁都、南明小朝廷的丧都，都标明了南京历史的沉重与苍凉。清代的南京虽无都城之名，但其风韵犹存，影响依在，继续发挥了她的领袖南方的作用。这里是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两江总督和江宁将军的所在地，控扼运河，官毅东南，照应北京，实为中华帝国的心脏之区。侵略者选择南京作为攻击目标，无疑是感受到了它的历史影响和现实作用。封锁运河和进攻镇江、南京，就像是一个“猛虎掏心”式的重拳打在清王朝的腹部。正如侵略者所希望的那样，这一拳“不但把朝廷而且把整个帝国打击得更加惊慌失措”。岂止是惊慌失措，简直是五内俱焚、六神无主。如果说侵略者攻陷厦门、定海、宁波等城时，清廷对投降还举棋不定，那么在英军进犯长江，截断运河，兵临南京城下时，道光帝及其一班投降派大臣们则彻底为侵略者的武力所镇慑。除了投降，他们再也想不出其它退敌之策。事实上，英国的有限兵力只能占领沿海沿江的一些城市或要塞，但要守住这些地方就会力不从心，至于广大内陆地区更是无法深人。清军完全有可能利用本土作战的有利条件，与英军持久作战，至少不会有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英军欲通过对中国经济中心的占领和隔断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联系，以达到牵制政治中心、迫其屈服的目的。清政府因害怕这种占领和割断，而俯首就擒，由此也说明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

南京扮演近代史开局的角色，与她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和她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南京是培育“王权”的沃土，成就“帝业”的地方，一幕幕王朝更迭的悲喜剧曾在这里上演。六朝金粉，八代帝都，极尽千年繁华。南京又是个英雄悲歌、王朝末路的地方，具有悲剧审美的意蕴。“三国衣冠同草莽，六朝宫殿总尘埃”。南京集辉煌与悲壮、繁华与废墟、喜剧与悲剧、雄奇与柔美、骄傲与耻辱于一身。它注定要领导时代的潮流，担当历史的大任，承载时代的重压，忍受失败的痛苦。历史选择南京作为吞咽战败苦果的地方，作为千年大变局的开局，作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作为沉沦与再生的起点，是因为它厚重、苍凉、悲壮、隐忍、坚定的历史性格能够化解最难的现实问题，能够面对最严酷的历史事实，能够负载最重的时代压力。只有南京这样的城市，才能经受住古老中华帝国瞒姗走向近代时所伴有的一切震颤、苦难与屈辱。

南京为近代史的开局之地，也与她在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有关。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黄河流域。到了唐代，南京所在地的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已占有重要地位。如与南京相去不远的扬州就是当时全国最为繁华的大城市之一，时有“扬一益二”之称。韩愈在《送陆欺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安史之乱后，江淮地区的人口总数和人口密度都遥居全国之首，国家赋税主要依靠江南八道。北宋时，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一带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各方面得到极大发展，最终确立了在全国的经济重心地位。北宋建都开封，主要依靠南方潜粮接济京师。“军国之用，多处于东南”。李靓在《寄上富枢密书》中说：″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足用……汴口之人，岁尝数百万解，金钱布帛，百物之备，不可胜计。″每年由东南地区运往京城的米粮常在六百万石左右，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达七百万石，有时高达八百万石。京城的军需民用，皆仰潜东南，东南之所出，已成为国家命脉之所系。“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经济重心区的形成，必然会结节成若干中心城市。扬州、苏州和南京等就是随着东南经济重心区的形成而结节成的经济都会，而南京在东南都会中的重要性因其优越的区位条件而日益突显，终于成为东南首位城市。这里又是南北陆路交通要冲。所谓“控引二浙，襟带江淮，潜运储谷，无不便利”。经济地位的上升，为政治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基础。立国于南方的偏安王朝能够保有东南半壁江山，经济上的富有和活力，起了重要作用。

明初定都南京，使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朝廷的物质供应和明初的政治安定。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以南京为陪都，并在南京保留了一整套中央政权机构。迁都使政治中心与政治军事斗争的中心结合起来，兼顾了国防重心和全国形

势。两京制的实行，又使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的战略意图。当政治中心在北方时，南京起了次中心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它的强大经济力量来影响政治。南京总括南方，是南方力量汇聚的地方。明代两京连接了南方长江流域的南京和北方长城附近的北京，沿着南北中轴线是华北、长江两大平原，大运河纵惯南北，从而形成了以南、北二京为中心，以大平原为腹地，以大运河为动脉的核心区域。北京的政治军事中心地位靠南京经济中心的财力支持，南京经济中心的发展需北京政治军事中心的庇护，而大运河则把两大中心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南、北二京都是百川归流的地方，北京总括北方，监控天下；南京领导南方，照应北方。两者一主一辅，一阴一阳，纵贯南北，构成中国政治地理格局中的轴心地带。清朝虽以奉天（今沈阳）为陪都，但奉天并未起到陪都的作用，而南京的两江总督建制，实有领袖南部中国的作用。当鸦片战争的炮火烧到南京江面时，清政府才感到致命的威胁，从心理上为敌所败，除了屈膝求和之外，别无良策。辛亥革命时的南京光复，迅即招致清朝的灭亡，由此足以说明南京的份量。

二、南京为百川汇流的历史漩涡

1853 年 1 月 12 日，太平天军攻克武昌，势力大盛，由数万之师发展到拥有 50 万众的庞大队伍。太平军进人到一个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是西人四川？还是北上河南？拟或东下南京？或者是以武昌为都？历史的启示，地理的大势，国内的形势及太平军的战略趋势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南京成为太平天国的首选之地。2 月 9 日，太平军从武昌出发，水陆大军夹江而下。3 月 19 日攻占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国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洪流汇聚于南京，由此揭开了太平天国的历史，拉开了两个中心、两个政权生死较量的序幕。历史选择南京作为反叛现存王朝的活动中心，作为新旧时代擅替的转折点，作为对清王朝致命一击的重拳，是南京历史的合理发展。南京再次成为历史激流的漩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定都南京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巨大胜利和历史转折，也是对清王朝的一个沉重打击。从起义之初到攻占南京，仅两年多的时间，太平军就从“一个相对狭小的省区叛乱转变成了席卷广大华中地区财富和兵源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公开与清王朝分庭抗礼，成为清王朝二百余年来最严重的威胁，这给北京造成的惊恐和压力，是难以形容的。据记载，当南京失守的的报告传到北京的时候，咸丰帝当着众臣的面流泪了。可见南京失守对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带来的心灵震动有多么严重。当时的英国香港总督兼出使中国全权代表文翰在他寄自上海的一封信中曾评论说：“一旦南京失守，帝国政府就将受到自叛乱发生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姑且不论该城作为中国古都所享有的显赫地位及相关的历史联系（如阁下所知，这在中国人心目中无疑具有很大影响力），这样一个地处长江之滨，雄踞帝国中心，并因临近大运河，而足以阻断一切交通、切断首都粮道的巨大而重要的城市若为一支强大的军队所占据，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不可漠视无睹的。这支军队的下一举动对于中国人和我们来说，都是令人玩味而又值得深思的。”南京建都对清王朝的打击是双重的，一是因为它的经济、军事地位重要，据此足以制天下之亢命，扼清廷之命脉，陷清朝统治以极大的经济困难和军事压力之中；二是它的政治影响和历史传统的重要。南京是当时南中国的最大城市，两江总督的所在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亚中心，历史上曾为六朝都城，朱元璋在此开基立国，据此足以号令天下，撼动全国，且为汉族故都，具有复兴汉族的号召力，仅南京的名字本身就有无穷的政治威慑力。虽没有资料证明太平天国南京建都给予清廷心理上的压力究竟有多大，但可以肯定地说，南京建都是一种王朝换代的信号，清朝统治者想必会有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

太平军据南京，“如龙归大海，虎负深山”，其势力骤成规模。尤其是“遏绝各省解京粮道，粮道不通，京师震动，部内部外官僚送回家眷，闲员学士散归大半，京城一空。只有近京之地，由海道运粮不多，故京城米价八十余文一斤，油盐柴炭，贵不待言。”北京的混乱和恐慌是空前的。南北漕运之不通和淮扬盐纲之废弃，已成为清廷南方各省的切肤之患和京师北京的扼喉。

建都南京为太平天国实现其农民革命理想提供了现实环境和实践条件。在太平天国的心目中，南京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天国的代称和化身，也是他们无限憧憬的“天堂”和心灵的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时代里，南京还是一个产生天才作品的地方，又是一个天才思想的试验场。“他们在进军途中所提出的许多价值准则都在南京城垣内这个太平天国社会里付诸实行，这里是太平军十分严酷的制度能够加以实现的唯一所在。”太平天国在天京实行圣库制度，设总圣库于天京水西门灯笼巷，军需民用仰给于圣库，人无私产。废除家庭，设男馆女馆。废除工商，以诸匠营和百工衙的方式进行集体生产。这些政策无不体现出天朝领

www.yangtze.org.cn

袖们改造社会、另建新朝的丰富想象力和浪漫情怀。《天朝田亩制度》无疑是天朝领袖们富有天才创意的伟大作品，最能代表农民阶级的大同理想。它在天京城内的推行，尽管归于失败，但不失为一种伟大的尝试。《资政新篇》的颁布，为天国社会描绘出一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蓝图，代表了天国领袖们顺应历史潮流的全新眼光，也最能体现天国的创造精神。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其思想价值却历久而弥新。两种社会革新方案都出自天京，足以表明时代激荡下的天京城所张扬出的创造激情。在天京，太平天国厉行革新，严禁吸食鸦片，不准饮酒抽烟，禁止妇女缠足，创立自己的历法，开创自己的文风，开科取士，选拔自己的人才等等，都是天国革新思想的具体实践。在天京，天国的领袖们还按照自己的政治构想建立了天朝政权和天朝体制，并使这种天朝政权建设推广到它所控制的所有地方，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政权体系真正建立起来。它的政治影响力和示范效应，立即迎来了一个农民革命的高潮。也许这正是定都天京的意义所在。

但不可否认的是，定都天京给太平天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严重的。南京在给太平天国带来胜利和辉煌的同时，也为天国事业投预设了一个陷阱。如前所论，定都天京虽然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给清廷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军事压力，但清朝统治的覆亡与北京的攻取联系在一起，尽管北京的占领不等于清朝的覆亡，但在没有打碎北京中央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就谈不上“取清而代之”的全国胜利。南京不能取代北京，北京不能加害南京，由此造成了一种两个政权、两个都城的并立和对峙的局面。太平军在南京的停顿和北伐的失败，使它永远失去了攻占北京的机会，从而也失去了“整个帝国”。这也是众多史家最为太平天国惋惜的地方。奔腾湍急的农民战争巨流在南京汇聚成一片浅滩，从而丧失了它“一路滔滔”的声势，再也无法奔涌向前，去涤荡清王朝的要害之区。

定都天京的最大失误也许就在于它改变了太平军的战略发展方向，使本该用于北伐的兵力不得不用于经营天京上游和保卫天京。因为天京的安危比北伐更为重要，而天京的安危又视上游的经营情况而定。“其注意上游，若婴儿之仰乳哺”，生存的需要超过了发展的愿望，固守南京的安排超过了进攻北京的打算，经营长江流域的劲头超过了夺取北中国的努力，满足于偏安的意识超过了“全图中国”的雄心。这与杨秀清最初的“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既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的战略设想正相吻合。不能说天国领袖们不欲犁庭锄穴，攻取北京，全图中国，但其所作部署与其应该的努力不相符合。还应当承认北伐军是天国的精锐之师，将帅不谓不勇，战绩不谓不著，但以两万之师，飘流疾进，直捣燕都，完成推翻清朝统治的任务，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无论是从当时的形势特点看，还是从战争双方的兵力部署和战斗力状况看，主力北伐都有胜利的可能。

就当时的形势特点而言，太平天国南京建都的巨大胜利引发了一场全国农民起义风暴，使清廷统治陷入全面的危机。福建黄威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江西天地会起义，安徽、河南的捻军活动，都是对清朝军队的有力牵制，客观上形成了多支农民军相互支援、彼此推动的有利态势。太平军对长江、运河水道的控制和对江南财富之区的部分占领，造成了清朝统治的经济危机。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北伐战争的进行。西方列强面对突如其来的农民起义风暴，表现出极大的观注和惊恐，在一段时期内还不敢冒然卷入中国内战，因而执行了“中立”旗帜下的双向外交政策。士气方面，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一路滔滔，迫使清军四易统帅，前后调集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终不免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太平军的破竹之势也表明它的战斗力和士气正处于旺盛时期，而清王朝政治上的腐败，导致它的军队士气低落，连连溃败。八旗、绿营败绩累累，已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太平军劲敌湘军还在极释之中。

天京定都带来了太平军战略战术的全面变化，由攻势中的防守转变为守势中的进攻，使清军〞不再无望地尾随于一支前进的和’劫掠’的大军之后，如今已能在一个或两个据点上集结他们的军队；因此，太平军也随即发现他们自己在南京和镇江被一支军队水陆围攻。从而也就拉开了天京城包围与反包围的战争厮杀。还在太平天国北伐军威胁到北京之前，自己的天京城已受到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威胁。在清廷看来，欲消灭太平军，“迅克金陵”是首要目标，并以此制定了以攻克南京为主要目标兼防其四处出击的战略方针。太平军在南京立足未稳，清军就针对天京竖起了南、北大营。天国虽取得了数次的破围大捷，但终不能彻底打破敌人的包围。除了天京、扬州、镇江三城的固守之外，天京上游的经营也直接关系到天国的存亡，遂有西征之举和皖赣根据地的开辟。天国赖有上游的屏障，才得以长期坚持斗争，但要控制上游地区，只能与各部清军反复厮杀，于是天京上游成了主要战场。

www.yangtze.org.cn

定都天京之日，本应是太平天国政权牢固建立之时，却不意造成了困守天京的被动局面；定都后的战略目标，本应是以夺取全国政权为方向，却不意演变成了天京上游的争夺战。由此也可见定都天京造成的负面影响。

定都天京的最严重后果也许就在于它对天国意志的销蚀和精神的瓦解。时髦、富有、风雅和美色，像是暖人的春风和醉人的秋月，销磨壮志于无形，征服英雄于股掌。当然，六朝金粉、烟柳繁华只是一种环境，并不等于它一定能够征服天国的英雄们。不过天国的英雄们确实面临着一种意志的考验。天国英雄们刚到小天堂不久，就有些陶陶然、醉醉然了。他们终不能抗御安富尊荣的引诱，壮丽的王府、华贵的生活、森严的等级、帝王的威仪等，都在销蚀天国领袖们的奋斗精神，侵蚀天国政权的健康肌体，一步步地引导天国领袖们走向脱离民众、追逐利禄、享乐腐化的败亡之路。当然，换在其它地方建都，他们也可能犯相同的错误，而且农民阶级本身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弱点，随时都会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但如果“不过早建都，没有较稳定和安逸的生活环境，不过早沉醉于封建的帝王生活”，而是一鼓作气、直捣幽燕，紧张的战争环境或许能够抑制天国领袖们内心深处私欲的膨胀和享乐思想的蔓延，不至于酿出天京内江、将士离心、士气骤落的天国悲剧。天京定都，使天国处于两线作战的局势，一方面要与围困天京的清军作战；一方面还要与心中的私欲、骄惰、享乐以及六朝金粉的氛围作战。与清军的作战悲壮英勇，与心中的及环境的敌人作战却显得狼狈不堪，以至成为天国溃败的重要根源。

三、南京为中华民国的策基之地

自 1864 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陷落起，沉寂了 48 年的南京在辛亥年间又重新崛起，做了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再次成为时代问题的核心和世人瞩目的焦点。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而南京定都又是革命党人保护辛亥革命成果的一种努力。历史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遵循了几乎相同的运动路线。两者都活动于两广，成事于武昌，收功于南京。所不同的是：南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存在了 11 年之久，而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只存在 3 个月的时间。但 3 个月的临时政府就倾覆了满清王朝，而存在 11 年的天朝政权终为清政府所败。

在华中革命党人的艰苦努力下，武昌起义爆发。武昌起义的成功，像晴空霹雷，强烈地震撼着古老的封建帝国。旬月之间，南方各省及山西、陕西等地相继光复，只有北方数省区仍在清廷的控制之下，从而形成了一种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作为首义之区的武昌和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及同盟会活动中心的上海，都欲以自己为中心筹建临时政府。11 月 30 日，光复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举谭人凤为议长。12 月 1 日代表会议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2 月 2 日，代表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同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南京的光复是对清王朝的又一次致命打击。消息传来，代表会议当即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代表于七日内齐集南京，并规定侯有十省以上代表报到，即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南京的光复，使上海方面找到了一个重新调整与武昌关系的平衡点。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既不失控制临时政府筹建权的原意，也为宋教仁、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领导人不甘屈居旧军人黎元洪之下而试图另创新局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更便于上海方面或江浙资产阶级立宪派人物施加影响，因而他们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南京。南京成为民国第一都城，是时代的选择和革命形势推动的结果，符合孙中山的建都设想和革命重心转移的实际情况，也是当时的人心所向，同时又是南京的历史影响和现实价值的体现。

南京建都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张扬。作为汉族政权的故都，尤其是作为明朝的肇基之地，是中原王朝面临异族压迫时的一种退却和反抗异族统治的力源中心。以此建都，本身就是光复汉族的一种力量动员和反抗异族压迫的一种政治号召，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洪、杨定都南京，看中的就是这种民族动员的政治资源，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将西洋宗教所激发出的造反热情与汉民族反抗压迫的民族情绪结合起来，不能有效运用南京的政治资源，最终招致失败。孙中山定都南京，则是对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和三民主义思想的一种宣传和实践。“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满清贵族的统治，光复汉族，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目标，也是革命得以广泛发动和普遍响应的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南京在汉民族的传统意识中，是凝聚民族力量的中心，光复汉族的旗帜和民族情感的寄托，这从南京一光复，就立即迎来沪、鄂双方及光复各省区众口一词的建都决定可得到说明。南京的历史传统和在汉民族心中的地位使它成为反抗民族压迫的一种政治号召和民族动员。近代史上它两次成为反抗清朝统治的南方民族革命的政治中心，决非偶然，正说明南京能最好地表达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也说明南京蕴藏着巨大的政

www.yangtze.org.cn

治号召力和历史影响力。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祭扫明孝陵，就是对“恢复中华”志愿的一种最好表达。

南京建都是近代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1911 年 12 月 29 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原两江总督衙门，也就是太平天国天王府内举行举行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大典，发表了《大总统宜言书》，宜告中华民国成立。宣言明确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历史使命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从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的那一刻起，南京事实上已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的第一座都城。而这时距朱元璋定都南京 633 年，距太平天国定都南京 59 年，历史再次把南京推向时代的峰巅。不过在历史大潮的涤荡下，它的昔日“帝王之家”的封建气息已荡然无存，呈现给世人的是一片新生共和国的崭新气象。根据修正后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宜告成立。这是一个由革命党人居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府。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 1912 年元旦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这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旨在“尽扫专制之流毒”、除旧布新、实施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和颁布，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继太平天国建天京于金陵之后，南京再次成为时代问题的核心和世人瞩目的焦点。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而南京定都又是革命党人保护辛亥革命成果的一种努力。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和南京历史符合逻辑的发展，也是南京人文条件、地理环境诸因素的促合及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主观选择的结果。尽管南京的都城地位很快为北京所取代，但南京作为民国的肇基之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近代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尽管南京的都城地位很快为北京所取代，但南京作为民国的肇基之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近代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既然南京为民国肇基之地，而孙中山确曾有建都南京的擘画，那么将南京建为民国的永久首都，自然是应有之义。民国成立的第六天，孙中山在与《大陆报》记者谈话时曾表示“南京将作为永远之都城”。但正式明确南京的首都地位，则是在南北议和已成，袁世凯将要成为民国新的临时大总统的情况下，孙中山为防止袁世凯日后专制独裁，保障辛亥革命的已有成果而断然采取的补救措施。孙中山认为，在被迫将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之后，要继续维护革命的成果，除了要求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等措施外，将南北统一后的都城设于南京，把不能令人信任的袁世凯调出其经营多年的势力中心，而置于革命党人的制约之下，就是非常必要的了，遂以“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制，害得毫无生气”为理由，要求将南北统一后的民国政府设于南京。1 月下旬，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开会决定，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后，“临时都城不得设在北京”。2 月 5 日，孙中山与内阁成员再次开会议决，“清帝逊位书发表后，参议院始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但须往任南京”。在这里，首都地点的选择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意义。“以北京为都，意味着帝国征服的传统和东亚霸权的继续；而在曾被革命的南方认为有可能作为共和国首都的南京或武昌建都，则意味着回到一个更为内向的传统，同时也是对新政权中的革命血统的象征性承认。”事实很明显，“不论什么人当总统，一个以长江沿岸任何一个省份作为所在地的政府，将会受到南方领袖们的支配。在这一地区，袁几乎没有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在北京，情况则相反。不论袁在政府中的正式地位如何，他的权威决不会被那些指定的或选举出来的官员们所忽视。”孙中山自信南京在革命势力掌握之中，以此为都，足以保护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不怕袁世凯日后专制自为。而袁世凯不肯离开北洋军阀的案穴南下就职，其真意也就在于怕失去凭藉为革命党人所乘。

孙中山坚持定都南京，还在于他要通过迁都南京，“涤除专制之流毒”，“一新天下耳目”。他认为，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痣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渝。必使失所凭籍，方足铲锄专制遗孽。迁地为良，庶可荡涤一般瑕秽耳。南方的经济性质、政治环境、人文条件及新旧两种力量的对比更适宜于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孙中山坚持把首都建在远离官僚政治核心的长江流域，或南京，或武昌，正是基于南北地域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差异和新旧力量对比的不同而作出的现实选择。而且北京受帝国主义的压力太大。自从《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大沽炮台被拆毁，自海口至北京不许设防，京师门户无存，列强并得长期驻兵，东交民巷的炮口直指新华宫（当时总统府），外交团无形中成为太上政府，颐指气使，而在炮口

下的中国政府不得不惟命是从。所以要打破外人所加给我们的枷锁，不能不首先将中央政府从帝国主义炮口下移出来，到一个稍能自立的地方去才能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不仅如此，南京又是扫灭胡元，克复汉土的民族英雄朱元璋复国的根据地，巍巍的明孝陵正象征着民族魂，建都于此，既是一种对满清王朝的彻底否定，也是对光复汉族事业的永远纪念。

辛亥革命把南京再次推上历史的峰巅。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了清王朝的覆亡和新时代的来临，但北京的传统政治中心地位没有随旧政权的垮台而丧失。袁世凯巧妙地利用了南京的政治资源，顺利地实现了北京政权的新旧更替。临时政府的北迁预示了革命成果的出让和北洋政府时代的到来。民国初年的建都之争是革命成果的争夺，政权的争夺，也是共和与专制的较量。在这场首都资格的争夺中，由于南京方面的软弱、北京方面的狡诈和双方力量的悬殊及历史传统的惯性作用等，南京终以临时政府的北迁而败北，从而也就预示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南京无意中充当了北京政权擅递的工具。

在近代中国，南京是唯一有资格和北京分庭抗礼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东南经济重心的位置最易培植出一个政治中心，而且也因为数百年王朝政治中心的历史培育出一种政治抱负，对领导中国政治的潮流总是跃跃欲试。她三次挑战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三起三仆，富有反叛精神，最具悲剧色彩。在某种意义上，她充当了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媒介和社会整合的工具。

〔责任编辑：肖波〕

www.yangtze.org.cn